

■ 关注

我们期待怎样的人文学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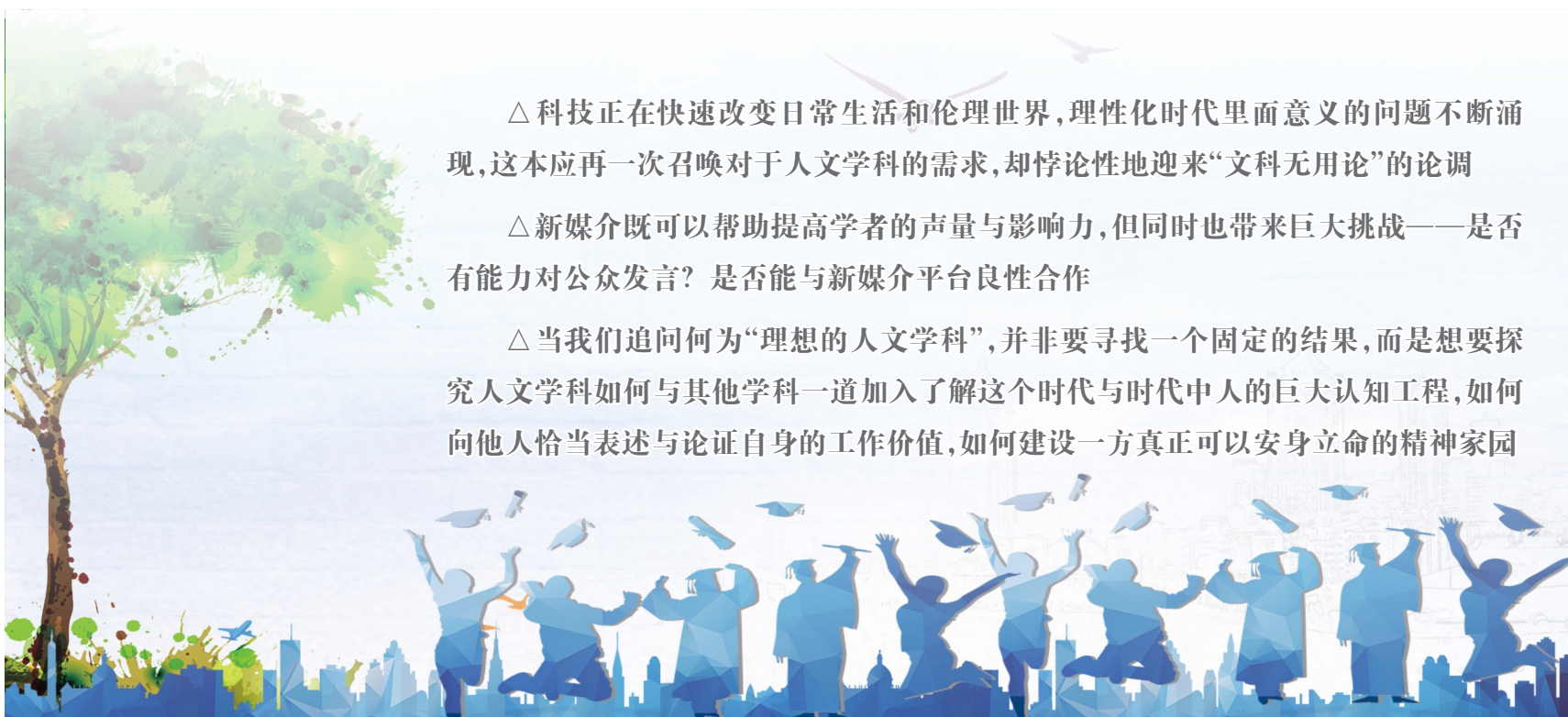
——从毕业致辞谈起

□ 李 静

△ 科技正在快速改变日常生活和伦理世界，理性化时代里面意义的问题不断涌现，这本应再一次召唤对于人文学科的需求，却悖论性地迎来“文科无用论”的论调

△ 新媒体既可以帮助提高学者的声望与影响力，但同时也带来巨大挑战——是否有能力对公众发言？是否能与新媒体平台良性合作

△ 当我们追问何为“理想的人文学科”，并非要寻找一个固定的结果，而是想要探究人文学科如何与其他学科一道加入了解这个时代与时代中人的巨大认知工程，如何向他人恰当表述与论证自身的工作价值，如何建设一方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毕业时分成为人文学科危机在社会层面“显化”的时刻

每到毕业季，各高校的毕业致辞总是牵动着人们的眼光，掀起一年一度的“周期性情绪”。毕业致辞篇幅短小且金句频出，能让读者一窥当代学院精英的思想风采，因而比较容易成为互联网上被频繁展示、转发、评论的流量景观。毕业致辞最能触动心弦之处，莫过于其“最后一课”的属性。“最后一课”处于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应然”之理想与“实然”之现实的交界处，因而师长们以何种姿态、口吻、导向来致辞，绝非易事，既要避免流于高蹈与说教，又要鼓舞即将“远行”的青年，进而契合这一充满仪式感与标志性的时刻。事实上，毕业致辞也是“教师自述”的时刻，作为教师的致辞者需要盘点自身工作的内容、方法与成果。毕业致辞同时也是某种“社会文本”，大众对之的阅读与评价，尤其能体现时代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

因此，毕业致辞或许能够成为我们思绪延展的起点，在这样一个“交界处”观察理想与现实、学院与大众的交汇。在这交汇中，“紧张感”最强烈的似乎发生在人文学科，社会大众对于人文学科的评价，往往与人文学科的“自述”存在较大落差：前者持有实用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态度进行评估，尤其是在“毕业”这一不得不直面现实的时刻，而后者往往使用自己的语言捍卫人文学科的价值与独特性。于是，毕业时分成为人文学科危机在社会层面“显化”的时刻。毕业致辞在社会层面所引发的种种观感代表了大众对于“人文学科”的不同定位、不同需求。尤其是关于文科的有用与无用之辩，正是人文学科危机的体现之一。

人文学科面临的危机是全方位的，其衡量指标包括在校数量与素质、专业课开设情况、教育方法与教育价值（投入产出比）、毕业生就业情况与薪资水平、社会价值感、学科合法性与自然学科、社会学科的挑战，等等。在这样的衡量标准下，人文学科自然被认为充满危机——又一批人文学科的毕业生涌入社会，他们会遭遇什么？笔者作为一名人文学科从业者，经常听到同行自嘲，确实是知识改变命运啊——越改越穷了！而一届毕业生的新鲜出炉，意味着又一轮培养周期结束，对于教育成果的“考评”势在必行，危机意识不能不油然而生。

人文科学总是与意义、价值与历史相关联，而这些无法用实用标准来衡量

必须说明的是，今天所说的“人文学科”之“人文”，已与古代中国判然有别。《周易》有言：“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是指用来约束人类行为举止的规章制度。而今天我们讲的“人文”，本

身就是一种现代知识组织制度，是相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而言的一种学科分类方式，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研究等具体内容。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科学渐渐地等同于自然科学，而人文科学也需要按照科学模式（实证性、因果律，等等）来建立学科的合法性与评价标准。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人文科学中哲学化、文化化的一面同时存在着。哲学化与实证化、人文化（知识分子化）与职业化（学者化）之间一直存在张力，也构成当代人文科学从业者必须打心自问的话题。

人文科学始终是作为现代理性、科学观念、科层教条、物质主义、机械化的某种对立面存在的。美国学者杰弗雷·盖尔特·哈派姆曾对现代人文学科的含义有清晰总结，他指出人文研究的基本原理包含三个前提，分别是作为客体的文本、作为主体的人性以及作为目标的理解。（参见《人文科学与美国梦》，生安锋译，王宇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也就是说，人文学者是以文本及其历史脉络为中介，研究人性，并最终指向对“完整的人”的理解与守护。当我们回顾20世纪80年代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的辉煌时期时，就会发现，每当来到意义重建、价值重建与历史重建的巨变时期，“哲学化”而非“实证化”的人文学科就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由此可见，人文科学总是与意义、价值与历史相关联，而这些都无法用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而工具主义与实用主义恰恰是今天主导性的评价逻辑。人文科学所面对的科层化律令与主流评估标准，跟它本身对于意义、价值、历史的亲密关系，构成一对恒久的矛盾，在历史进程中反反复复以各种形态出现。

带着这样的困惑，笔者于2023年11月4日召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第104期青年文艺论坛，主题为“人文学科，位置何在？”——在“科层化”与“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延长线上”。与毕业致辞不同，这场论坛是从从业者之间的讨论，邀请了近十位研究者、出版人与媒体人共同探讨。这种讨论方式依然是“人文科学”式的，执着于文本与历史的解读，但解读方式绝非学术式的，并非要将历史作为“纪念碑”高高供奉。相反，这次讨论携带着强烈的现实困惑，将两次知识界的讨论合而观之，希望能够从中看清“其所来路”，并为当下提供思考资源。2023年是科玄论战100周年，以及人文精神大讨论30周年，贯穿这两场论战的核心问题之一是，通过现代学术，现代人如何在科学霸权与工具理性主导的时代中安顿自己的主体性。这关乎艺术、道德、人生观等问题。今天这样的问题并没有被解决，反而更加突出，似乎也更加无解。科技正在快速改变日常生活和伦理世界，理性化时代里面意义的问题不断涌现，这本应再一次召唤对于人文学科的需求，却悖论性地迎来“文科无用论”的论调。或者说，这类论调，正是人文学科未能很好

承担自身使命的结果。

寻找改变的契机，一点点拓宽有所作为的空间

当然，批判是容易的，但往往也是廉价和无效的，首要的是应该对现状有更深刻的认识，并从中寻找改变的契机，一点点拓宽有所作为的空间。或许有两点是当前需要正视的维度。

其一，学院制度对于人文科学与人文学者的影响。去年底有个段子流传甚广，即“一个人文科学青年学者如果从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没有开够四次会，那就说明你还没有真正融入学术圈，该努力了……”这个段子揭示出当前人文科学青年学者生存状况的一角——接连不断的学术会议、项目制管理、量化考核、填表报销、薪资待遇偏低——这些足以让青年学者们殚精竭虑，很难想象在这样的前提下，还能剩下多少精力放在教书育人的事业上。这类结构性暴力与形式理性下的实质性不合理，是个人难以抗衡的，并且内化为更年轻一代青年学者的精神焦虑。一定程度的学科制度与管理考核制度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制度本身教条化、形式化之后，是对人文基本精神的严重背离。

其二，媒介变化对于知识生产的影响。除去学院体制，学者往往选择与出版社、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等力量合作。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合作往往备受青睐，而如今，“知识网红”的诞生早已令人见怪不怪，一个深度媒介化的知识传播体制已经形成。这意味着知识的传播更具即时性、互动性、现实针对性，更被媒介制约，并且需要提供某种情绪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高等教育的知识传授特点。对于当代人文学者来说，要不要适应以及如何适应这样的变化，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新媒体既可以帮助提高学者的声望与影响力，但同时也带来巨大挑战——是否有能力对公众发言？是否能与新媒体平台良性合作？除了做知识的搬运工，能否真的提供新思想与新见解？从这个角度看，人文科学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总之，毕业致辞所带来的“周期性情绪”应该弥漫为日常工作中一步步坚实的反省与改变。时代正在发生巨变，人文科学无法自外于是。当我们追问何为“理想的人文科学”，并非要寻找一个固定的结果，而是想要探究人文科学如何与其他学科一道加入了解这个时代与时代中人的巨大认知工程，如何向他人恰当表述与论证自身的工作价值，如何建设一方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不是要重复文化保守主义，而只是因为，与人文科学密切关联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需且珍贵的。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 综述

6月28日至30日，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文论的‘双创’实践”论坛在江西赣州市举行。赣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利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明，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海军，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名专家与会。

从文艺发生的本源探讨到创作体验的细腻描绘，从文学批评的多重视角到文学体裁的演变发展，无不体现出中国文学理论的丰富与深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袁喜说，中国古代文论的“原心说”认为文学源于心灵的感应并影响文艺构思，其丰富思想构建了古代文艺发生学的观念体系，是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大学副教授袁劲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的“摘笔”现象，认为其作为书写体验的重要部分，被文人广泛关注并阐发于创作及批评中，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河北大学副教授杨青芝将“熏浸刺提”与“兴观群怨”进行对照阐释，分析了它们在功用上的异同，勾连起小说与诗教的相通之处。

学者们通过聚焦某一特定阶段文论或微观个案，勾勒出各个时期文学审美风貌与理论发展的轨迹。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彭国忠聚焦北宋时的“平淡”批评美学，认为北宋“平淡”批评与科举改革同步，兼及人品与文品，精准地将科举改革与文学风格转变相联系，展现了社会变迁对文学风尚的深远影响。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蒋寅分析了“老”“清”“厚”“境”等美学范畴，阐释了明清诗学的丰富理论内涵。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汪群红认为，中晚明文学工夫论融合了传统的多种思想，涵盖文体规范、心性修炼及身心锻炼等方面，对文学创作观念产生深远影响。扬州大学青年教师孙盼盼对汉魏六朝“以神为美”审美范式的剖析，揭示了汉魏六朝对于艺术超越性的追求。

《文心雕龙》是古代文论绕不开的经典文本。武汉大学教授李建中分析了《文心雕龙》篇名中的动词如何呈现语义内涵、实施语用意图及建构话语体系，指出其兼具性特征为当下中国自主知识产权话语建构提供了方法论启示。赣南师范大学教授吴中胜认为，“子学”作为中华文化极富创造力的部分，其深邃的理论视野和思辨精神对《文心雕龙》的文化品格和言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暨南大学教授闫月珍从高翔、灏灏、入感三个角度切入，指出在《文心雕龙》的修辞体系中，动物行为、外观及形象分别被用来描绘文本风格、修辞文法及作为作者经验内容融入文学作品，体现出中古时期的动物审美观念。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黄诚被认为《文心雕龙·夸饰》中的“摹拟写真”说，通过从“写貌”到“写气”再到“写真”逐级递进的描写途径，展现了文学创作从形似到神似的追求，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并涉及形神、现实与艺术关系等深刻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与现代转化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明指出，从“断着讲”“照着讲”到“接着讲”“接着讲”，中国文论的发展体现了从维护传统到现代创新的转变，而今学者应致力于古今接续、活古化今，利用古代智慧转化现代文论，以适应该时代的需求，并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文论话语体系。暨南大学教授蒋述卓认为，传统文论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需在新时代通过守正创新，融合古今中西，焕发当代活力，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独特的人文价值、原创理论、艺术生命观及审美标准，回应新时代文化使命。深圳大学教授高建平探讨了文学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系，并阐明了“文学原理”与“文学理论”的区别，同时指出文学理论需植根于文学实践，并提出了中国文论发展的三大策略：拿来主义、实践检验与自主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中国文论如何回应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 吴中胜 钟诗雅

学研究所编审吴子林结合当代述学文体的创构，指出中国文论传统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重视“尊体”“辨体”，现代学人应融合中西文论，重建汉语思维，以激活文化基因，实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互补与平衡。山西大学教授邵伟认为“五四”后中国古代文论经历了现代性转化，在此过程中，现代阐释成为主流，不仅激发了思维方式的动态发现式转变，还促进了理论建构向本土化土壤回归，而这一转变的目标正是为了寻求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独立阐释学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圣元深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肌理，提出了多维度的文化传承与发展策略，聚焦中国文论阐释学的重构、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推进、经典化路径的探索，以及如何将文献学研究成果有效融入人文史学研究等关键议题。武汉大学教授刘金波以“反”与“通”为方法论，巧妙融合学术精神与工具理性、人文精神与学术伦理，探索了在面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等复杂议题时，如何通过传统坚守与文明转化等策略，为解决现实问题、构建文明新形态贡献力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厚均探讨了从山水美学这一古典美学范畴向“美丽中国”现代理念的转化路径，细致剖析了传统文论资源如何在当代社会语境下焕发新生命。

推进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需要我们采取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在早期华夏文明中，诗、乐、舞三者紧密交织，共构为同源异构的艺术综合体，承载了丰富多元的文化使命与审美表达。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赛认为，庄子发展了老子的音乐美学，提出“天乐”论，构建道家音乐理论体系，对中国音乐美学理论有深远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张金梅从“长言”“嗟叹”“永歌”之辨说起，讨论了“嗟叹”在诗乐中的不同作用、诗乐各自的功能与特质，强调了诗乐在创作过程中的紧密联系与早期诗乐一体的文化特征。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姚文放通过对比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与王良的“尊身论”，深入阐述了中国古代身体美学对舒斯特曼理论的支撑与超越。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金宝英借助朱利安的美国研究，对比中西古代美学的异同，既揭示了中国形式美学的独特魅力，也直面其在当代转型中的挑战。南昌大学教授何世剑深入比较并融合中西生态美学思想，认为它对于解决当代生态危机、构建和谐社会的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这次论坛不仅重新审视了古代文论的精髓，还将置于现代语境与中西对话中进行考量，为解读中国文学、中国文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支持。

（吴中胜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钟诗雅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第十三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幕

本报讯 7月12日，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和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京开幕。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高洪波、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以及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文艺界专家学者代表、学校师生代表等参加开幕式，并与现场观众共同观看了歌舞剧《猫神在故宫》。开幕式由第十三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组委会主席、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冯俐主持。

第十三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以“点亮童心 塑造未来”为主题，分设优秀儿童戏剧线下展演、国际优秀儿童戏剧线上展播和“绽放·启航”优秀作品展演等板块，汇聚8个国家25家儿童戏剧团体的33部剧目。作为开幕式剧目，由中国儿艺和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的歌舞剧《猫神在故宫》用戏剧艺术的形式让文物“活起来”。由河南省光山县长山小学演出的儿童剧《少年司马光》和《灯火》是中国儿艺“新时代种子计划”授权作品，展示了儿童戏剧助力乡村振兴的成果。4部“绽放·启航”儿童青少年舞台艺术孵化计划第二季的优秀作品展演，也

为优秀青年艺术人才提供了更高的展示平台。同时，国际优秀儿童戏剧线上展播将在多个平台公益展播来自6个国家的8部各具特色的儿童戏剧作品，展现世界儿童戏剧的多元风貌。戏剧节期间还将举办戏剧“艺”起来系列活动，通过探秘舞台、亲子体验和“小小剧评人”“温暖行动”等戏剧普及活动，打造一个全民参与的戏剧节。

当天，中国儿艺联合东城文旅集团首次推出了儿童艺术市集，营造充满戏剧魅力与童趣的艺术氛围。据悉，戏剧节期间，中国儿艺开展的“优秀剧目2024暑期巡演100+活动”还将携《猫神在故宫》《西游记》等10部儿童戏剧作品赴全国15个省区市演出172场，将优秀作品送到孩子们的身边。

在过去的十二届中，中国儿童戏剧节共在线上展出了国内外314家剧院团带来的530台儿童戏剧作品，已成为展示儿童青少年戏剧成果的窗口，也是儿童青少年戏剧的世界知名品牌之一。

（王觅 陈则旭）

中法建交六十周年暨圆明园鼠首兔首回归特别纪念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觅）6月28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法国开云集团共同主办的“回‘首’启明，继往‘开’来——中法建交六十周年暨圆明园鼠首兔首回归特别纪念活动”在国博举行。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陆进出席活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高政、法国开云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弗朗索瓦-亨利·皮诺出席并致辞。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副局长郑浩，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与科学

事务公使衔参赞裴国良，以及文物回归亲历者、文博专家等文化艺术界人士齐聚一堂，观看纪录片《国宝回家》，共叙两国文化艺术交流佳话。

高政在致辞中表示，在庆祝中法建交六十周年的大背景下，我们共同纪念这一回归盛事，意义重大。博物馆根植于社会、归属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它的发展也必然需要全社会每一分子的关注和参与。皮诺表示，中华文明对全人类有着举足

轻重的影响，很高兴能够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传承贡献力量。

鼠首和兔首铜像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喷水池上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中的两件，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流失。2013年，鼠首和兔首由法国皮诺家族向中国政府无偿捐赠，并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后，鼠首和兔首一直在国博“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展出。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举办首届品牌日活动

本报讯 为更好地展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艺术生产成果，推动集团创新发展，7月3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首届“亮丽倍行”品牌日活动在京举行。活动现场，主办方对演出剧目、文旅项目、艺术空间、艺术培训、数字创新等多项业务进行了集中推介。

近年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推出致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创造者、传承者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图》，在海外外引发热烈反响。目前该剧已演出超过550场，并获得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规定时间内舞剧演出场次之最”“同一城

市连续演出场次最多的舞剧”荣誉。活动现场官宣了《只此青绿》绘本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据悉，由中影集团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联合打造的中国首部沉浸式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也已完成拍摄，目前正在进行后期剪辑与视效制作，希望借由光影的力量，把该剧诗意的写意、画的留白呈现在大银幕上。

本届品牌日活动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巡演剧目和新剧策划的一次集中亮相。据介绍，集团现有的巡演剧目包括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现代舞诗剧《诗忆东坡》、音乐剧《绽放》《星辰》《将进酒》《飞天》、民

族舞剧《孩儿枕·家和兴》等。此外，音乐剧《高歌》《潮起东方》《寻找李二狗》、舞剧《天下大足》《海誓》《永乐未央》等也正在筹备中。活动现场，主办方与格尔木市人民政府等9家单位进行战略合作签约，并发布了音乐剧《大江向东去》的推广曲《一棹烟雨》。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景小勇表示，集团将以此次品牌日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聚合优势，不断推进跨界融合，坚持资源优势互补，积极推动潜在市场需求的开发，创新合作的机制模式，努力提升东方品牌形象与影响力。（王觅 陈则旭）